

流水四十年間——紀念張灝院士*

Miscellaneous Memories of Forty Years: In Memoriam Academician Chang Hao

王汎森 (Wang Fan-sen)**

4月22日上班途中，突然收到余英時師母從美國打來的電話，我倉促接起，師母說：「張先生過去了。」因為車子剛開進隧道，有點慌亂，我忙問：「那位張先生？」我之所以沒有馬上想到是張灝先生，主要是因為今年2月的捐書國圖線上典禮中，雖然第一眼並未認出張先生，但後來定神一看覺得他的狀況似乎還不錯，所以完全沒想到兩個月後，張先生便故去了。

張先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大師，在他眾多的著作中，以「幽暗意識」、「轉型時代」兩個主題有關的論述最為聞名。事實上他在許多方面的工作都敏銳而有洞察力，如梁啟超與近代思想過渡、儒家經世思想的闡發、近代思想中的「意義危機」、「軸心時代」的問題，乃至於近代中國革命、烏托邦、近代中國自由民主發展的問題等等。張先生的著作影響力廣大、深遠，他的論點及思考，深深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兩、三代學者。而且，他的許多著作對於仍在摸索自由民主前景的華人世界有重要的意義。張先生著作俱在，大家可以參看，倉促之間，我只能在此談談我與先生的幾次會遇。

—

仔細回想，我初見張灝先生正好是四十年前，也就

是在1982年夏天，我隨《中國時報》棲蘭山莊會議的成員一路從臺北臺大會館附近坐車到宜蘭棲蘭山莊。記得遊覽車在北部濱海公路上行駛，然後在一處風景點停泊休息，我聽到余英時老師盛讚這一條公路的美，一如加州的卡邁爾公路（所以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一遊卡邁爾公路）。當人們紛紛從洗手間出來時，我主動上前向張灝先生請教了一個問題，當時年方四十五歲的張先生侃侃而談。我記得余先生開玩笑地說：「張灝又在吹牛了！」然後兩人相視大笑。

在整整四十年的時間中，張先生與我同在一地的機會很少，但是值得寫的東西應該很多，現在因為時間及手頭材料不齊，只能先寫幾件個人印象深刻的事。

張先生很少寫信，可是在我們初識幾年中，我好像收到過他幾封信。第一封信，大約是在1983年春他回我的信，內容我不記得了，其中有一段是希望我精讀韋伯（Max Weber）的幾本書，記憶最深的是《宗教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張先生信末用了讀完上述諸書後「自然人港」四個字。

當時臺灣刮起一陣韋伯熱，許多韋伯的英譯都有盜印本，而我在這股熱潮中如饑似渴地讀了所有能到手的韋伯著作，但《宗教社會學》（英文本）卻是陌生的。所以，我曾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軍官宿舍，每天晚上就著

* 張灝先生故逝之後，我接連應邀以〈流水四十年間〉為題寫了紀念文章，標題雖然相同，內容卻有差異，本文是各種文字的聚合，謹此說明。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盞黃燈閱讀《宗教社會學》。對我而言，這本書相當晦澀困難，將近一百天才看完。如今，書中的論點大多不復記憶了。

另一封信大概是在 1985 年，我將新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寄請張先生指正。想不到，張先生居然來了一封信祝賀。張先生非常大度，在他第二本英文書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一書中，曾多次引用《章太炎的思想》一書的論點，使我受寵若驚。

在棲蘭山莊之會後的幾年間，張先生好像一直被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這本書稿牢牢糾纏住，拖了七、八年，遲遲未能完稿付印。張夫人警告他，如果不將這本書作一個了斷將要如何如何！

我感覺張先生早期關心梁啟超及近代中國文明的過渡等問題，而在這個階段，則相當關心歷史人物的生命氣質、生命意義、存在感受以及社會秩序的問題。我記得張先生告訴我，*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一書的副標，原來是想用 *Beyond Wealth and Power*，表示他不認為近代中國的轉型，一切都是在追求「富」與「強」——這是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成名作，《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的英文標題：*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同時也有意義，存在感受方面的激烈衝突。不過後來張先生還是把副標題換成了「尋求意義與秩序」。張先生非常敬重史華慈，他平常談話中經常提及「我們的班老師」（班傑明·史華慈）。他口中的班老師雖然手忙腳亂、毫無組織，上課不大準備，手上也沒有大綱，往往隨口問學生：「上次講到哪裡？」「喔，宋（朝）……」，然後零亂地繼續說下去。但是張先生每每又用神往的臉色表示「可是那裡面有東西」。這也是張先生評論各種著作時常有的措辭，「哪本書雖然如何如何……但裡面有東西」。

張先生也受到一批神學家的影響，如 Reinhold Niebuhr, Paul Tillich, Wilfred Smith 等（此外他也受 Eric Voegelin 的影響），所以他對近代思想中「意義危機」這方面問題特別重視，而且在這方面考慮得非常深入。

我感覺張先生在中年之後，對生命存在與意義關懷，有很深刻的感受。在他的若干著作，包括在〈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英文，收在 Charlotte Furth

編的 *The Limits of Change*）、*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還有〈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等都深刻表現出來的。這是他與同代學者不一樣的地方，其實在西方史學界，思考這方面問題的人也很少。

生命存在與意義關懷除了表現在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之外，也表現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一書，並有一部分擴散到「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的討論，「幽暗意識」一文首次發表便是在 1982 年棲蘭山莊那次會議中。

我覺得張先生後來對「幽暗意識」有進一步的思考，大約是張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學（1998-2004）的後期。我們曾談到他當時所關心的問題，他提到對「惡」的來源感到興趣。我注意到任鋒所編的《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一書中收了一篇張先生的〈我的學思歷程〉，其中提到有一種「極惡」（如納粹、如南京大屠殺），從之前由「人性」出發的路徑沒有辦法完全解釋。張先生說：「所謂極惡是我們無法用常人的心理或動機去認識或測度，它代表一種不可思議、難以想像的現象」。還要從人世陰暗的兩個外在源頭：制度與文化習俗或思想氛圍去解釋，「人置身其中，常常不知不覺地受它的驅使與擺佈。」

除上述幾點外，我感覺張先生內在有一個張力：他是殷海光的高足，對老師的情感很深。如果順著這一條思路走，應該是竭力批判傳統的。張先生對傳統思想、文化始終有其批判性，當然是因早年深受這方面洗禮的影響。但張先生後來又受到新儒家的洗禮，及余英時先生，還有他的同學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等人的影響，尤其是到哈佛後，他對「傳統」屬於精神意義及存在感受的部分，把握得特別深刻。「傳統」與「現代」確實在他內心形成一種張力，但這種「張力」也有很重要的生產性，從他早年的〈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中便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張先生認為近代政治思想中有很多傳統的根源。猶記 2012 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作系列演講——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即是我於《思想史》第十期中發表的一篇長文〈宋明理學與近代中國的政治

行動)。金耀基院士看到講題之後告訴我，「如果張灝在一定很感興趣」，也就是說張先生對現代政治與傳統元素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一向很注意。

二

1987年，我到美國讀書。在美國留學期間，因為課程非常緊湊，所以我只在1991年第一次到美國中西部。查當時殘留的一個筆記本，我是在那年6月2日坐灰狗（也是唯一一次）到匹茲堡先拜訪許倬雲先生及老友葉匡時，接著丘為君駕車載我到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Columbus）。晚上9時出發，12點才到。如今，我還清楚記得車子奔馳於平坦且一望無際的中西部公路上的情景。張先生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三十年，這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在哥倫布市的家。

那一次拜訪，我們匆匆談了我的博士論文。張先生西方思想史的造詣非常深厚，我們的談論很快集中在實證主義對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影響，以及它如何改變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維的問題。

在這一次短暫拜訪張宅的過程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房子的壁紙是淡藍色的，還有玻璃屋式的大書房；匆匆一瞥，最顯眼的是一大套用舊了的四部叢刊。我記得張先生當天在一個餐廳設宴招待，席中他還說過，「泡麵的味道真是過癮啊！」多年後，我在臺北一個餐宴中引用這句話時，女主人相當不快地說：「王汎森，我請你吃這麼豐盛的菜，你居然大說泡麵。」

張先生是位沒有架子的人。我回國後在史語所工作時，張先生每次來臺參加院士會議時，總會設法到我研究室坐坐，看看我正在看什麼書，並隨便聊幾句。

1999年，我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一個學期，由於張先生當時也正在香港科大任教，所以我們在香港清水灣曾經有兩、三次盤桓。談話中，我覺得張先生當時的學術關懷主要是「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當時張先生因為心臟手術，所以只能吃無油無鹽極為無味的食物。由於來往交通費時，所以每次總是來去匆匆。印象中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談及近代激烈思想的線索，張先生一再指出譚嗣同、李大釗這一思路的關鍵

性。二是張先生希望與我合寫「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另外還有一件趣事：有一次晚飯之後，張先生突然表示，聽說你學過跆拳道，能否演示一下，我當即在他客廳踢了一陣。張先生很快便抓住重點：「你慣使右腳！」

三

2019年8月28日，張灝夫人病逝，所以我與內人決定趁去美國開會時，前往Reston造訪張府。當年9月23日傍晚，我們終於從普林斯頓一路摸到Reston。這也是與張先生最後一次的長談。從9月24、25日，我們都是早上11點多去張府，然後一直談到吃完晚飯再離開，中間（24日）還在傍晚時一起去了Lake Ann遊逛多時。

這次談論主要是張先生的人生經歷，尤其是張先生早年求學時期的趣事，以及張先生藏書將來的歸宿，此外還有四點。一、他說，他們一家是1949年到臺灣，在臺灣讀書十年，1959年到美國讀書，然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三十年，退休後到香港科技大學擔任八年講座教授，從香港回到美國之後，在Reston待了十四年。

二、張先生說他到美國讀書之後，醉心於理論，到處聽課，深受Robert Bellah影響。他特別提到Bellah是他當時求知的一個線索。在哈佛，他深受那一代活躍的幾位學者影響：Talcott Parsons、Robert Bellah、S. N. Eisenstadt、Clifford Geertz（經Bellah介紹）。張先生說，他的導師史華慈對他到處聽課有贊同也有保留。余先生曾經告訴我，張灝先生學生時代總是往哈佛的威廉詹姆斯大樓（社會科學）跑，有一次他問張先生，你為什麼老往那裡跑？張先生回答說：「這個我不管了！」

三、在這一次談話中還提及他的父親張慶楨教授／立法委員。張教授是芝加哥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是民國法界耆宿，廣受學生愛戴。我們談到已故監察院長王作榮的回憶錄《壯志未酬》（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9）中提到當他父親晚年生病住院時，昔日學生自行組織、排班輪流在醫院照顧老師的情形。在這次談話中，我們也談及他父親優渥的成長環境，父親的弟弟在大陸醫療衛生系統中的工作、父親的留學經歷，以及他

與姊姊一度寫信給芝加哥西北大學詢問關於父親留學疑惑的趣事。

除了上述之外，我們當然還談到許多往事，還有一、兩個學術問題，尤其是我多年來一直在試著梳理「清代統治的不安定層」的問題。這一次談論，雖然沒有得到確切的結論，但張先生也發表了一番意見。

張先生是名父之子，自幼生活優渥，父親對獨子寄望特深，所以經常帶他到處向長輩請教，其中包括程滄波。程滄波負文名，當時請教的範圍主要是古文，所以張先生能背古文，而且古文已經化成他血肉的一部分，日常談話之間，「爾公爾侯」之類的句子經常脫口而出。有時又雜以武俠小說中的「拳法亂了」之類的話。

張先生認為人與人交往，最好的境界是「相視一笑，莫逆於心」。所以不為時空所限，也不必拘泥於繁文縟節。在過去四十年中，我個人深受張先生的支持與照拂，到了不知如何言謝的地步。有幾年，我受困於某種病苦。張先生非常注意此事，在院士會議期間，急著找相關院士請教藥方，其情其景，如今仍然歷歷在目。

張先生欣賞的生命氣質是方重而帶有矯矯之氣。他幾度告訴我，他不喜歡秀麗的書風，偏愛方、硬，帶有碑味的書法，這其實也反映在他寫的硬筆字上。張先生連感嘆都有古典味。

前所說過，我個人是在整整四十年前，認識了仰慕已久的張先生，並從此開始了我們四十年不間斷的交往。在這個交往的過程中，我們都忽視了歲月的腳步悄悄走近。

2019年秋天，我突然收到張先生女公子的信，希望幫忙處理張先生的藏書與文件。由於張先生與中研院近史所關係密切，由近史所保存非常恰當，所以我馬上連絡了近史所。雖然近史所藏書空間非常有限，但當時的所長呂妙芬很快答應了，並準備派圖書館員前往評估搬運的作業。然而在我親自到 Reston 與張先生長談之後，我感覺張先生對把書捐出似乎有所猶豫。人畢竟不容易與終生相伴的藏書、筆記一刀兩斷。尤其是之前不久張夫人才過世，張先生顯然不能從痛苦中自拔。張先生的女兒也感受到這種遲疑，所以雖然張先生最後曾帶我上樓評估如何處理他的藏書，但是我們當下只是默默巡禮一番，並沒有進一步談。

我覺得處理藏書應該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事件」，所以這件事緊急告停。此後張先生從華盛頓匆匆搬到加州，捐書之事便遺落在我們意識的角落了。

直到今年1月我再度收到張先生女公子的信，希望能儘快處理藏書。我聯絡了臺北的國圖，國圖夙負聲望，而且正在南臺灣建立一個很大的書庫，我覺得這是一個合適的歸宿，而曾淑賢館長收到訊息便即刻同意了。

我從未檢視過這批藏書、文件，目前它們也從美國運到臺灣。不過，張先生讀書有作筆記的習慣，他個人的文件、筆記一定有很值得探討的地方。至於他的藏書，反映了他的學思歷程，當然值得重視。

今年2月，我在張先生藏書捐贈給臺灣國家圖書館的典禮上發言提到「大魚小魚」的比喻。大意是說，我覺得教育是大魚帶著小魚游，小魚長成大魚之後，又帶著小魚遊，如此循環往復，至於無窮。張先生是一條「大魚」，帶著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年青人游，如今這群年青人中一大半都已經退休或將要退休了，新的一群「小魚」也已漸漸成了大魚……。

我曾說過，在歷史上某些轉折的時刻，會有「天才成群而來」的現象，像19世紀，在俄國人文學界圍繞別林斯基周圍的一群傑出人物；像1920至30年代，在米塞斯周圍形成的「維也納經濟學派」。僅以我個人比較熟悉的幾位前輩：余英時、許倬雲、張灝、林毓生等人物為例，他們也是「成群而至」。

我觀察這個現象與幾個因素有關。一、他們是1949年國共政權更迭後的一代，深受時代刺激，並從各個方面持續反思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這個反思，多少促成了他們對中國歷史、傳統的新思考。二、他們大多深受西方哲學、社會、經濟等重大思潮的影響，而且將這些資源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密切結合起來，而迸出火花。

回想起來，2019年秋天那三天，也就是張先生與我最後一次見面，在那次見面中，張先生反覆說：「勸君不能老！」「既往矣！」尤其是「既往矣」一句，反覆再三，令人悵然。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說：我與我的身體有神秘的契約，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神秘的契約可以維持多久。張先生的驟逝，令人「大悲無言」，思之慘澹不已。